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
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邓力群 安平生 李力安
 有 林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伟志	王治国	杜荣泉
李松晨	吴家珣	张殿民
赵炳章	唐合俭	黄勋拔
程炳卿		

《当代陕西简史》编辑委员会

主编 何金铭 赵炳章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 旦	冯家臻	刘云岳
朱新民	何金铭	李振东
赵炳章	姜 桦	

撰稿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改民	朱新民	李润乾
邱国虎	赵炳章	

总 序

地方史,中国自古有之,谓方志,语出《周礼·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秦汉一统,疆域扩大,国势甚盛,及司马迁、班固出,史学之盛也前所未有。从此以后,历代官私史著繁多,包括方志。而方志中也不乏传世佳作。清代史学评论家、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方志并非地理专书,而应是内容宏富的地方史;还主张国史当择善、取裁、凭据于方志。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凝聚力,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深厚的根基,理应与重视国史方志这一优良传统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把地区性研究摆在优先的位置上。五六十年代,截至“文革”,全国已有 530 多个县成立了地方志编纂机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省、市、县相继建立了这种机构,确然形成了“盛世修志”的局面。从 198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

当代陕西简史

增订本

(1949——2000)

当代中国出版社

年秋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写并陆续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从而把地区性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80年代末,《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即将出齐,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把地方史研究更向纵深推进?经过反复讨论、协商,大家达成共识,在各地当代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当代地方简史。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支持,使之得以作为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来部署。

编写当代地方简史,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科学的态度分别编写新中国建立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部简明的信史。要精心选材,巧妙编排,深刻说理,以真实、确凿、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提供一种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材。简言之,要真实地再现各地当代史,使之真正起到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

一部引人入胜的史书,当然要写好重大事件,写好人物,如实地再现历史过程,展示社会面貌,脉络清晰,文彩斐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要有特色,做到“四个不一

样”——与地方志不一样,与《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不一样,与地方党史不一样,各个地方不一样。从方法论上说,“四个不一样,所涉及的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它要求同中见异。地方简史与地方志、《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地方党史都是以反映或再现各地的当代史为要旨的,而各地都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全局性的方针、政策都是统一制定和推行的,这些就是共性。如果地方简史仅仅停留在这一共性上,而无个性特色,它就失去了问世的理由。只有从上述四个方面加以比较,找出差别,地方简史的个性特色才会凸现出来。当然,强调个性、特殊性并非对共性有所轻视,因为“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毛泽东:《矛盾论》)。注意研究各地历史发展的个性,不仅可以科学地把握住本地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可以更好的把握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共性。

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普遍而同时开展地方简史的研究并以纬时经事的体例来编纂,这是头一次。我们陆续编辑出版的30部史书只是这次行动的第一批成果。毫无疑问,地区性研究须不断拓宽和加深;开展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简史进行增益与修订,将

会是把地区性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的一条有效途径。

这套丛书讲述的虽然是昨天的事,但是,“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全国各族人民,定能从其对昨天的回顾中,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从凝结在这套丛书的真理性认识中吸取力量和智慧,拼搏进取,奋勇向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五年八月

总结过去,指导现在,创造未来

张勃兴

《当代陕西简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中的一卷,是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巨大工程中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指导下组织编写的,是陕西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共同创造的。能够有这样的著作问世,值得庆贺。

陕西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陕西人民不畏艰险,辛勤劳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国的创建也立下了不朽功勋。然而最光辉最值得骄傲的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这50多年。就在这一期间,陕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尽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道路崎岖不平,在前进中付出了不少代价。但是,现在的陕西,已经由一个古老文明而又落后的农业省,变成了我国内陆的一个

既有古代文化风貌,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的新兴的工业基地。

回顾这段光辉的历史,真是令人欣慰,也催人深思。它有力的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也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拓前进,是陕西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康庄大道。

当然,还必须看到,陕西虽然取得如此光辉的成就,但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历程中,也不过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一大步。展望未来,建设现代化的陕西,任重而道远,还需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努力,继续不懈地探索、实践,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陕西在中国有许多自己的特点,也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不仅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而且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培育的延安精神,光耀神州大地,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丰富的资源和 50 多年的建设成就,是陕西人民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物质基础;雄厚的科学技术力量,是陕西继续前进的巨大推动力量;地上地下遗存的丰富而珍贵的文物古迹,雄伟秀丽的自然景观,为陕西发展旅游业,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特别是改革开放,将进一步解放陕西的生产力。所以,陕西的振兴是指日可待的。只要全省人民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把陕西建设好。

《当代陕西简史》正是对上述情况的正确反映。它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陕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实事求是地展示了陕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业绩,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揭示了陕西 50 多年来历史发展的轨迹,使人从中得到许多教益和启示。可以使曾经为陕西社会主义创业立勋的老同志感到亲切,受到鼓舞;使正在从事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年轻同志了解陕西,获得经验和教训;使青年学生感受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来之不易,从而珍视已有的成就。因此,本书的出版,为陕西今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为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和改革开放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材。对各级干部认识省情、了解本省历史,提高思想水平、政策水平,从实际出发,做好工作,有所裨益。对于全国和世界想了解陕西、关心陕西、支持陕西、建设陕西的同志和朋友也有所帮助。它有助于世界认识陕西,陕西走向世界。因而,本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不了解过去,很难预见未来。研究历史,是为了指导现在,创造未来。本书的任务,不是出版了就算完结。关键要使它发挥作用。希望所有三秦儿女都能阅读它,了解自己和自己的父辈所创造的光辉历史,继承过去的优良作风,发扬过去艰苦创业,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现有的基础上,谱写陕西历史的新篇章,为创造更加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

目 录

总序	
总结过去,指导现在,创造未来	
绪论·····	1
第一章 陕西的新生 ·····	27
第一节 保卫延安 ·····	27
第二节 解放全省 ·····	35
第二章 建立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 ·····	41
第一节 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 ·····	41
第二节 恢复国民经济 ·····	48
第三节 恢复时期的成就·····	60
第三章 社会主义制度在陕西的确立 ·····	64
第一节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 ·····	64
第二节 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 ·····	77
第三节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发展·····	85
第四章 在探索中建设社会主义 ·····	93
第一节 良好的开端和整风反右 ·····	93
第二节 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 ·····	100
第三节 调整国民经济 ·····	113
第四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121

第五节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的成就和教训	127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内乱与建设	132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蔓延	132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	149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三五”、“四五”计划执行状况 ...	155
第六章 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166
第一节 “三线”建设在陕西的布局	166
第二节 “三线”建设在陕西的实施	174
第三节 “三线”建设的成就	176
第四节 “三线”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187
第七章 伟大的转折与改革开放	191
第一节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1
第二节 伟大的转折	196
第三节 改革农村经济体制	202
第四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	210
第五节 思想观念的变革与清“左”防右	224
第六节 “五五”、“六五”计划完成情况	229
第八章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235
第一节 “七五”计划的执行和治理整顿	235
第二节 在治理整顿中深化改革	244
第三节 平息动乱和保卫社会主义改革	253
第四节 全面完成“七五”计划	263

第九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71
第一节 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和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准备	271
第二节 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84
第三节 奔小康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	298
第四节 加强宏观调控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302
第五节 反腐倡廉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07
第六节 精神文明建设与市场经济同步发展	312
第七节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完成“八五”计划	321
第十章 迈向二十一世纪	337
第一节 绘制发展蓝图	337
第二节 创造发展环境	342
第三节 开展“三讲”教育	355
第四节 狠抓扶贫帮困	362
第五节 打改革攻坚战	370
第六节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399
第七节 圆满完成“九五”计划	403
结束语	411
后记	430

绪 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陕西历史也就随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到2000年这50多年，陕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艰难曲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光辉业绩，真是可歌可庆。为了展示陕西广大劳动人民创建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总结他们的历史经验，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简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陕西历史，是整个陕西历史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为了不割断历史，为了更好地衬托和展现这段历史的壮丽景象，首先简要地回顾一下陕西在共和国建立以前的历史及其特点是十分必要的。

陕西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历史的缩影。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陕西居于重要地位，发挥了很大作用，其特点十分明显。

一、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

提到陕西，人们自然会想到陕西光辉灿烂的古代历史。的确，陕西在中国5000年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100万年前，陕西这块土地，特别是关中区域，水草丰盛，气候湿

润，土质疏松、肥沃，易于耕耘保墒，便于植物根系伸展，便于先民们用石器、骨器垦殖。在蓝田猿人生活地区的地层，发现有森林动物虎、象等，证明当时的关中有优良的自然条件。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渭河两岸早期人类活动比较多，人口比较集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比较高。西安市东郊半坡村遗址的发现，说明大约在 6000 多年前，陕西关中已经成为最完整的母系氏族社会，从村落的结构和出土的大量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陕西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和谋生的手段已经有很大的提高，开始进入了以耕织和集聚定居生活为主的农业社会。这同古代传说中教民稼穡的神农及造屋宇、制衣服的轩辕时代颇为相近。这些都说明陕西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它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开化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据考证，我们的国家始称华夏、称中国，都与陕西特别与关中有关。因为周王朝兴起于渭河流域，以擅长农业著称，以夏文化的继承者自豪。为了表彰先人的功德，即夏的功德，区别于当时生产较为落后、过着游牧生活的戎狄部落，于是称呼自己统治的地区为区夏。所谓区夏就是保持夏文化的地区。周灭殷后，分封诸侯，所封诸侯，同属周的文化体系，称为诸夏。由于当时“华”字是“夏”字的同音推衍，所以“华”与“夏”、“诸华”与“诸夏”并用，有时合称“华夏”。另外，由于周代农业发展较快，开始有了城邦，周的统治者把自己居住的城邦称为京师，又称为国。后来，把周统治的全部领土称为中国。战国后期，民族进一步融合，需要一个统一的名称来反映这一趋势，“中国”这一称号便适应这种需要代替了“诸夏”通行起来，沿用至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华夷之分，并非不同地域与血统关系之分，主要是根据文化发展的先进与落后来区分。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后来称为汉族），把四周的少数民族当作“异类”看待，然而

当少数民族接受了中原文化后，便采取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原则，不再把他们视为异族。而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总是以华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以自己的先世也是黄炎华胄为荣（如匈奴自称为夏后氏之苗裔，北魏拓跋也称自己的先世是黄帝之子孙而封北土者）。他们进入中原后，推行民族团结政策，改革旧俗，以适应当时已经建立的封建生产关系。我们这个稳定的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我们这样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的。

二、中国古都之最

秦中自古帝王州。陕西作为都城所在地，始于西周。最早，西周建都于岐山之下的周原，在今岐山和扶风两县之间。其后周文王建都于毕郢，在今咸阳市东。后又迁于丰，在今户县东北。周武王时又迁都于镐。镐在丰东，隔沔河东西相望。周懿王时居于槐里，在今兴平县东。秦国虽屡迁都城，但都在陕西境内。春秋时，迁于千河和渭河的交会之处，后迁于平阳，今宝鸡县东，再又迁于雍，今凤翔县南。战国时，迁于泾阳，后迁于栎阳，今临潼县境内，再又迁于咸阳。秦统一六国后，仍以咸阳为都城。在长安建都的最初是西汉，不过当时的长安在今西安市的西北。以后从新莽到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和西魏、北周都在这里建都。隋朝虽另建新都，命名大兴，地址移到龙首原下，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区。唐王朝立国 290 年，均建都于长安。绿林拥立的刘玄，赤眉拥立的刘盆子，黄巢的大齐和李自成的大顺也都在长安建立过政权。此外大夏建都于陕北统万城，在今靖边县无定河北，当地人称白城子。从这些事实看，中国历史上有 14 个王朝和 4 个农民起义政权建都于陕西，历时 1100 余年。除了十六国时期的大夏建都于陕北外，其余 13 个王朝和 4 个农民起义政权均建都于长安。所谓西安是

13个王朝的古都，是指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6个统治全国的王朝和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5个分裂时期的统治部分地区的王朝，以及东汉和西晋末期暂短迁都于长安的两个王朝。不管怎么说，长安是中国六大古都中建都时间最长而又是最著名的一个。

三、盛极一时的古代经济

中国古代，由于众多王朝在长安建都，自然会促进都城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形成全国经济中心。在商朝后期，泾水、渭水流域商朝的属国周，迅速发展起来，周的首领文王借鉴商的统治者酗酒耽猎，连年征伐，使国力虚弱下去的教训，任用姜尚等人，帮助整顿政治和军事，提倡节约，限制打猎饮酒，亲自参加耕田，实行裕民政治，生产不断发展，国力日益增强。文王晚年，已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2/3，武王即位后，经牧野之战，灭了中原王朝商，两年后去世，周公旦辅佐成王，除了平定管叔、蔡叔、霍叔联合武庚发动的叛乱，巩固西周的统治外，还将周的重农节约的传统制度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中国水利史》载：“《周礼》稻人所叙灌溉之利，堪称完备，其实施区域，殆即以陕西省为中心，今眉县、周至、户县、长安、蓝田各县，沿秦岭山下，稻田纵横。”成康时期，谨守周公之典，数十年少用兵、刑，生产又得到发展，当时的关中，一片兴盛，成为西周经济的主要基地。

到东周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振兴国家。商鞅死后，其法未废，一直坚持改革，实行耕战政策，重视发展生产。在关中建凿郑国渠，灌田4万顷，使关中平原成为先进农业区，人们称“天府之国”。此外，秦国还按军功和生产的贡献进行赏赐，使人们重农乐战，贵族如无军功即取消其特权。还坚持重用客卿的传统、注意引进外来人才。使落后的秦国一变

而成为先进的国家。秦始皇即位后，已是兵强国富，实力超过六国。他“奋六世之余烈”，进行统一战争，用兵不到10年，便灭六国，统一了中国，结束了800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统一货币、文字和度量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专制王朝。都城咸阳及其所在地关中平原，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物产丰富。《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财富，什居其六。”虽然当时的关中是指秦统一前的故地，包括陇东和巴蜀，但也足以说明关中经济之发达。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于滥用民力，大修宫殿、陵墓和长城，加重赋税，严刑峻法，激化了同农民的矛盾，不到15年秦王朝灭亡。刘邦继承了秦的基业，建立汉朝，立都长安为西汉，称高祖。他采用王霸杂用的政治，政行宽简，对民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保持和平安定的局面，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恢复和发展了生产。高祖以后的几代皇帝，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文帝常常奖励努力耕田的人。景帝时，下诏称农是天下的根本，说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两次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甚至有10多年不收田租，使生产得到很快的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在文帝、景帝相继创建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业绩上，战胜了威胁北方安全近千年的匈奴，收复了河西走廊，建立河西四郡，继而又收复河套，建立朔方郡，并向西北传播了先进农业技术，使河西走廊与河套成为西北粮仓。与此同时，他派张骞通西域，取得了36个属国，为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国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在内部，他削平了诸侯王的叛乱，使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和加强，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他同先代帝王一样，十分重视生产，注重水利工程建设。不仅在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了六道辅助渠道，称为六

辅渠,而且在该渠的南面又开凿了著名的白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三百里,灌田4500余顷。”还由长安附近,循南山之下,开了一条漕渠,东向入于黄河,漕运300余里,缩短了航运距离,且能灌溉良田一万多顷。此外,还开凿了龙首渠,发明了井渠法^①,扩大了关中东部,即今大荔一带的灌溉。在长安以西,今眉县东开成国渠,引渭水东至武功县南入灵轺渠,又由眉县东引渭水东下入灵轺渠,灌溉周至、眉县、武功一带的农田。这样就在关中平原基本上形成了灌溉渠道网。在耕作方法上大力推广赵过的代田法,使用先进的农业工具——耦犁和耒车^②,促使农业有了飞跃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高峰。在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冶铁规模很大,已经开始用煤作燃料。纺织业已经使用提花机,丝织品已有锦、绣、绢、纱等。精致的纱料,有的薄如蝉翼,做出的单衣,重量还不到一两。更为重要的是都城长安,已成为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总枢纽,西域人将当地的奇货源源输入,如汗血马、葡萄、苜蓿、葱、蒜、芝麻、核桃、蚕豆、黄瓜等经过长安传到内地;中国先进的农耕技术、井渠法和炼钢术,尤其是丝织品等,也从长安源源不断地传到西域各国。那时的关中和长安自然成了中外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尤其是丝织品的集散地,因为当时的蚕桑区主要在黄河下游,那些地方的丝织品只有集中到长安,才能销往西域,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枢纽,其繁华程度可想而知。东汉中期以后,关中和长安逐渐呈萧条景象,历经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时期,不

① 在地下开渠,井井相连,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井渠。后传入西域,为今之“坎儿井”。

② 耦犁是二牛挽犁,一人扶犁,一人牵引二牛,每牛可种四、五顷。耒车是下种器,同耦犁联合使用,耕播同时进行,更能提高工效。

时发生战争,加之西北游牧民族的相继内迁,经济难于发展,很难恢复到秦汉时期的繁荣境况。在这个时期,长安虽曾间断地作为都城,如西晋愍帝就在这里恢复过西晋的王朝。其后,前赵、前秦、后秦和西魏、北周也都在这里建都,但都难以同秦汉时期相比。前秦苻坚时期,虽有“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的景象,但远不如秦汉时期。

隋文帝杨坚重新统一全国后,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生产,南北经济文化又得到交流。在短短的20多年里,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作物产量有了提高,长安、洛阳一带的官仓里,储藏粮食多的达到千万石,少的也不下数万石。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商业也发达起来,造船技术达到很高水平,已经能造宏伟的战舰。当时都城长安及关中又呈现繁荣富庶的景象。隋炀帝即位后,奢侈腐化,滥用民力,发动战争,又打击了经济的发展。隋灭后,从唐高祖到唐太宗直至唐玄宗,长安及关中作为全国经济中心达到了历史上经济文化繁荣的最高峰。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从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任用有才能、敢直谏的大臣,进一步调整统治政策,采取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生产的政治经济措施,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到唐玄宗时,进入全盛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这个时期,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改进了犁的构造,创制曲辕犁^①和新的灌溉工具——筒车,^②手工业较前有很大的

① 曲辕犁,旧式的犁是直辕,唐朝农民改为曲辕,曲辕犁耕地时可以调节耕作深度,操作灵活,便于深耕。

② 筒车,形状像纺车,轮子周围绑着许多竹筒,筒车随水流自行转动,竹筒就把水汲到高处,这种筒车又叫水转筒车,功效比翻车大。

发展,在手工业作坊里,有许多工艺高超的工匠,制造了各种精美的物品和丝织品。制陶技术很高,创制了著名的“唐三彩”。都城长安,显得额外繁华,它不仅仅是全国政治中心,而且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也是开放性的世界大都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达百万的城市。城外,道路四通八达,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通往长江中下游及其三角洲的富庶地区,遵循汴河的水路而达,是当时的交通命脉。另一条是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由于这些道路的畅通,各方货物云集,更促进了长安的繁荣。城内,街道整齐,树木成行,两边均有排水沟。皇城南边朱雀大街,最为宽阔平坦,是长安南半部的中心线,把南城分成东西两半,东边有东市,西边有西市,这东西两市都是繁华的商业区,各有200多个行业,而店铺又很多,仅东市就有几千个。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有吐蕃、突厥、回纥、契丹、南诏和西域各族人。有来自亚洲各国的经营珠宝、腰缠十万贯的胡商,也有卖胡饼的“穷波斯”和狎酒劝客的胡姬,有同文人学士往来酬唱的日本人、新罗诗人和在国子监里钻研儒学经典的外国学者,还有在青龙寺潜心钻研佛经和中国文化的空海和尚。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亚洲各国、各族不同的服装,可以听到亚洲各国、各族不同的语言。当时的长安成为国际著名人物的荟萃之地,其繁华程度高于世界各国城市。

“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百年兴盛的境况。以后由于藩镇长期割据的混战,使关中经济日趋衰落,整个黄河中下游的经济也遭到了破坏。唐灭亡以后,政治中心东移,长安作为长治久安的首都地位,从此一去不返,陕西经济的发展则受到很大影响。然而随着北宋统一事业的完成和政治局势的稳定,陕西社会经济一时又呈现繁荣景况,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盛唐时期。在农业方面,水利事

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关中东起同州朝邑,西至眉县、武功,南到长安樊川,北到彬州、三原以及陕南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已修建了许多灌区。宋徽宗时其灌溉面积达唐宋五六百年间的最高数额。在手工业方面,各种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金、银、铜、铁、铝、铅、水银和朱砂等,各种产量均有较大增长,关中铜钱岁铸就比唐代增加了近乎10倍。森林资源也得到巨量开发,公私所用良材,不少采自秦、陇山区。真宗时,凤翔造船场,每年造船600艘,一度居全国11个造船场的第二位。另外,彬州的火箭和剪刀,在北方颇有名气,因而也成为皇家的贡品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耀州瓷器的生产,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整个十里窑场,“居人以陶器为利,赖之谋生”^①,工匠制瓷,技巧纯熟,“方圆大小,皆中规矩”^②。其成品,釉色翠绿,釉面莹润,“巧如范金,精比琢玉”^③。“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湿湿如也”^④。其技艺之高超,制品之精良是前所未有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宋代陕北富、延一带的人民,已开始利用石油作为照明的燃料,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使用石油的最早记录。而且,从此以后,“石油”这个名称也为世界各国所通用。

由于北宋农业和手工业的兴起,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当时的长安城虽比唐代大大缩小,但人口仍有十几万,城内大商,“家累巨万”,民间小商,势力也很大。盐、茶商贩,北上陕北,与西夏边民互市,南下入川,与蜀民交易,“往返获利最厚”。长安城内,“衣冠豪右错居其间,连甍按栢”^⑤,居民习俗之侈,仍不失故都之风。尽管如此,但总体上已经失去了居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只是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所决定,陕西

① ②③④见陕西博物馆藏《德应侯碑》。

⑤ 见《善感禅院新井记碑》。

特别是西安才成为中央政权控制西部的统治重心。

四、丰富多彩的古代科学文化

陕西古代，特别是周秦汉唐时代，不但经济盛极一时，而且科学文化十分发达。早在西汉时代，农学家赵过，主持创制三脚耒，一天可播种一顷地。后又创造代田法，有利于抗旱保墒，休养地力，提高产量。三国时期，机械制造专家马钧（今兴平县人）改进织绌机，提高工效四五倍；制造的龙骨水车，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时人称为“天下之名巧”。隋唐建筑学家宇文恺，朔方夏州（今靖边白城子）人，后迁居长安。他在设计大型宫殿建筑时，已能使用比例尺，绘有平面图，并用木头作成立体模型，开创了制作建筑模型的先例。他所写的《东都图记》、《拜疑》、《明堂图议》等著作，对我国建筑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唐初建筑学家阎立德，雍州万年（今西安市）人，他主持修建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骊山汤泉宫、铜川玉华宫，建筑风格独特，至今很有价值。唐朝天文学家李淳风，岐州雍（今凤翔县）人。在太宗时，他在前代浑天仪的基础上制成浑天黄道仪，解决了汉代“太史黄道铜仪”所遇到的黄道环不易与黄道对准的难题。高宗时由他创造颁行的麟德历，减少了原来通行的戊寅元历的错误。唐初医学家孙思邈，京兆华原（今耀县）人。他总结了前人及自己的临床经验，于70岁时，编成《千金要方》30卷，100岁时编成《千金翼方》30卷，共记载6500多个药方，集唐以前药方学之大成，列举药材8037种，记载药性、采集时间和炮制方法，创立脏病、腑病分类系统，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后人尊为药王。医学家王焘，眉（今眉县）人。天宝年间，写成《外台秘要》40卷，辑录了唐以前医学家治疗各种疾病的医理和药方，共分1104门，载6000余方。许多散失的医学著作及名家验方，多赖此书存其概略，与

《千金要方》可互相补充。唐水利工程专家韦坚，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他主持开凿的兴城渠，在咸阳筑堰拦渭水，截灞水和浐水，与渭水平行而流，到华阴永丰仓又与渭水合流。还在长安城东望春楼下凿广运潭，停泊往来船只，使关东向长安漕运的粮食，每年由20万石激增到400万石，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陕西古代除了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外，人文科学方面的史学、文学、哲学等均有极大的发展，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史学家、文学艺术家、哲学家等。其中最著名的政治家有周公，曾助武王灭纣，辅成王东征，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苏绰，曾助宇文泰建立和推行府兵制度和控制劳动力户籍制度以及预算次年赋役的计帐制度等，使以关中为基地的西魏由弱变强；杜如晦，是李世民的重要谋士，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当时各种典章制度多为二人商定，为贞观之治起了重要作用；寇准，助宋真宗破辽，订立澶渊之盟，赢得了和平。

著名将领白起，又名公孙起，善于打歼灭战和攻城战，曾指挥著名的伊阙之战、鄢郢之战、长平之战，使秦军在军事上对六国居于压倒之优势；王翦曾率秦兵破赵、燕，灭楚，为秦统一全国作出了重大贡献；郭子仪在安史之乱初期，率朔方军在河北大破史思明叛军，后充关内河东副元帅，联合回纥兵收复长安、洛阳，经7年多的征战，叛乱始平；韩世忠于公元1130年率兵8000，打败金兀术10万兵马于黄天荡（今江苏南京附近），1134年，在大仪（今江苏扬州西北）大破金与伪齐联军，1141年，又败金兵于淮河沿岸。

著名使者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拓了著名“丝绸之路”，对加强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对促进中外经

济文化的交流，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苏武奉命出使匈奴以求和好，被扣留牧羊 19 年，身不忘使命，手不离汉节，表现出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班超出使西域 30 年，加强了西域和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丝绸之路”的畅通。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历时 13 年，写成巨著《史记》，其体例成为我国编纂“正史”的楷模，也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文学作品，其文彩成为我国散文的典范。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彪续作的《史记后传》65 篇，班固的《汉书》，班昭为《汉书》补作的八表及《天文志》，姚思廉的《梁书》、《陈书》，令狐德棻主编的《周书》，杜佑撰写的《通典》，都为我国史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著名文学家白居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作品的艺术成就很高，通俗易懂，当时不仅传遍国内，而且传至日本、新罗（今朝鲜）等国。其代表作《秦妇吟》，皆是长安见闻，《新乐府》中的《新丰折臂翁》、《杜陵叟》、《卖炭翁》、《陵园妾》等名作，都是关中人民苦难的写照。现存诗 2806 首，数量在唐诗人中首屈一指。杨炯，为“初唐四杰”之一，擅长五律，代表作《从军行》，洋溢着慷慨报国的热忱，很有气势。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其代表作《出塞》，被人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杜牧为讽刺唐敬宗大起宫室而作的《阿房宫赋》，成为千古名文。

著名哲学家张载，独创新论，讲学关中，把天、道、神等都解释为气，建立了气一元论的体系。批判了佛教关于“空”、“无”的唯心主义观点，把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对宋以后唯物主义的发展有巨大影响。

著名书法家颜真卿自创“颜体”，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郁勃，雍容大度。柳公权自创“柳体”，笔力劲秀，结体瘦健，与“颜体”并美。世有“颜筋柳骨”之称，对我国唐以后历代书法均有很大影响。

许多外省人在古代陕西，特别是在长安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的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对秦国由贫弱变富强作出了较大贡献。郑国在关中主持开凿郑国渠，使关中变成沃野。玄奘在慈恩寺译出梵文经 75 部、1335 卷，并撰写《大唐西域记》流传甚广，对丰富我国的文化作出了贡献。一行（原名张遂）在长安 10 年，致力于天文研究和历法改革，是世界最早主持大规模测量子午线的人。李白在开元天宝年间两次来长安，居住约 3 年，写出了著名的诗篇。杜甫曾寓居长安 10 年之久，写了许多取材于关中的不朽诗篇。他继承和发扬了《诗经》以来的优秀文学传统，达到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的高峰，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王维在长安居住长达 8 年，为著名田园诗人，艺术上极见功力。他体物精细，状写传神，富有画意，具有独特美感，苏轼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毕沅在清乾隆时期曾任陕西巡抚，著有《关中金石记》、《关中胜迹图志》，并给重要古迹树碑立石，对我国文物研究和保护做出了贡献。还有许多外国人在古代陕西，特别在长安，做了许多工作，对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印度鸠摩罗什于后秦时期在草堂寺译经，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日本先后派来唐使不下 19 次，对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把汉文化和佛教文化移植到日本，给日本文化以巨大影响。鉴真东渡和空海归国，中国的建筑、文学、医学随之东传。朝鲜新罗时代的文学家崔致远，12 岁来长安求学，后考中进士并做官，对唐文化在朝鲜的传播也起了重

要作用。

总之，自汉以来，到唐代，由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吸取域外文化，使我国科学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唐代长安，科学文化艺术的繁荣是空前的。僧一行的大衍历，孙思邈的医学，吴道之的绘画，杨惠之的雕塑，都超过前人。韩愈、柳宗元的散文，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达到古代诗文的最高水平。所有这些，既是中国历史的骄傲，也是陕西古代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一页。

五、源远流长的革命传统

陕西不仅具有发达的古代经济和古代科学文化，而且具有源远流长的革命传统。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数百次之多，或大或小地推进了历史的发展。陕西也不例外，农民起义不仅次数多，而且多次建立政权，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促进了历史的发展。早在公元前841年，就爆发过“国人暴动”，冲进首都镐京王宫，赶走了暴虐的周厉王。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在公元17年和18年相继起义，反对新莽。公元23年绿林起义军攻入关中后，广大人民纷起响应，推翻了新莽，建立以刘玄为首的更始政权。公元24年赤眉军不满更始政权的腐化，又攻入长安赶走刘玄，于公元25年6月建立以刘盆子为皇帝的农民起义政权。唐末黄巢起义，转战10省，于公元881年，进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明末，1629年李自成在陕北率领农民起义，北呼南应，转战14年，于1643年，率军进占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张献忠于1630年在陕北米脂参加起义。他自成一军，转战豫、陕、鄂、皖、川等地。1643年取武昌，称大西王。旋克长沙后，宣布钱粮三年免征，湘赣农民群起响应。1644年再取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

清末，太平天国革命的火焰，点燃了陕西回民起义的熊熊

烈火。太平军在安庆失守后，派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祐王蓝成春率3万大军，远征陕西。1862年1月陈得才等从庐州出发经河南，由武关进入陕西，越秦岭，逼进西安。因搭救英王陈玉成于五月撤出陕西，但仍激起了陕西回民起义，揭开了震撼全国的陕甘回民起义的序幕。这次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反对清王朝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历时达12年之久，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少数民族斗争史上是少有的。

1863年1月，陈得才率太平军10万再次入陕，攻克平利溯汉水而上，“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连克兴安（今安康）、汉阴、石泉等县，直逼汉中府城。在太平军进入汉中地区之前，李蓝起义军余部蓝大顺（蓝朝柱）已入据汉中，并在洋县建立了临时革命政权。他配合太平军夺取汉中府城。随后，蓝大顺为扩展和壮大革命力量，率主力军向关中进发，翻越秦岭，出新峪口，占领周至县城，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陕西回民起义军。正当太平军在陕南取得辉煌胜利时，天京危机，为解救天京，陈得才于1864年2月再次率军东下。天京沦陷后，太平军（西捻军）梁王张宗禹于1866年10月率军挺进陕、甘，联合回军，取犄角之势，互相支持。1866年12月，张宗禹在西安灞桥十里坡歼灭陕西巡抚刘蓉所部湘军14000人，取得入陕首次大捷。清政府见势不妙，急促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迅速赴陕镇压，并制定“剿捻宜急，剿回宜缓”的策略，把主要矛头对准捻军。之后，太平军转战陕北，在宜川县云岩镇建立临时根据地。回民起义军与捻军相配合，形成了捻军“自南而北有千余里”及回民起义军“自西向东亦有千余里”的燎原之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捻军和回民起义军最终失败了。

虽然捻军和回民起义军失败了，但它大大提高了陕西人民

的革命斗志,使陕西成为当时和以后反清统治的一个革命中心。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激化了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占领江南财赋地区,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顿减,“此时京饷及军饷,均赖山、陕两省接济”^①,从而使陕西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严重地束缚了陕西生产力的发展。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和1900年同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的签订,腐败的清政府更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伟大而文明的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地处西北内地的陕西,本来经济就很落后,这时更是每况愈下。清政府的对外巨额赔款,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穷奢淫逸的生活费用支出,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分摊到陕西来。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庚子赔款一项,陕西就负担白银60万两,加上由此而借的外债,每年还本付息计30余万两。其它开支,如办新军、上缴和解往他省的军费开支每年总计不下90万两。至于官吏薪俸及其它支出更是名目繁多,层层加码。这样巨额银两的筹集,都是通过苛捐杂税,向人民搜刮的。当时除了国家规定的附于地丁者有新加之赔款、差徭,附于盐课者有新旧之盐斤加价,附于厘金者有烟、酒、糖之加税外,陕西还有办学有捐,办警务有捐,筹地方自治有捐,谋地方公益有捐等等。而捐到各府、州、县,名目更多,有地捐、亩捐、随粮派捐、按人抽捐、商捐、赌博捐、陕北米脂县还有“烟亩捐”等,如此繁多,无所不有。农民负担捐税数倍增长,加上地租、高利贷的剥削,一遇到水旱灾害就难以生存。1900年天

^①《清实录》咸丰四年二月。

旱无雨、禾苗枯萎,赤地千里,加上以后几年连年歉收,粮食奇缺,粮价飞涨,地主豪商,乘机大肆剥削,贫苦农民成千上万流落满路,卖儿卖女,弃地逃荒,出现了“秦中道殣相望”“饿殍载道”的悲惨景象。当时陕西人口800多万,饥民竟达300多万。饥民流亡,土地荒芜,生产凋敝,整个陕西处于荒凉衰落的惨境。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逃至西安,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她所到之处,均要竭力预备皇差;凡住所,必须房室宽大,粉饰一新,张灯结彩,并摆奇花异草。慈禧个人不顾国难当头,依然挥霍如旧,每日三餐耗银200余两。在陕8个月,挥霍白银12万两,且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搜刮民财600—700万两,满载而归。这对当时贫困的陕西人民来说,是雪上加霜。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在经济入侵的同时进行文化侵略,外国传教士也大肆进入陕西。他们以帝国主义列强作靠山,又得到清政府的默许和支持,到处传教,在全省各地共建大小教堂及各类传教点500余处,有教徒3万多人。他们以传教为名,打着“行善”、“广布天主仁爱”的幌子,肆无忌惮地奴役和蹂躏人民,所到之处,侵占大量土地,欺压群众。

有剥削、有压迫、有侵略,必有反抗。清政府的苛捐杂税,加上封建主义的剥削,帝国主义教会的欺压,激化了阶级矛盾,陕西人民掀起了强烈的反帝斗争。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点燃了长期蕴藏在陕西人民群众中的反帝怒火。7月,宁羌州(今宁强县)燕子砭300余农民,不堪忍受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欺压,发动了一场“反洋教”的斗争。他们杀死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郭锡德及其作恶多端的爪牙6人,揭开了陕西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序幕。8月,三边(今定边县、靖边县和定边县安边镇)1000多人打着揭发“杀洋灭教”的旗帜,攻打陕西